

会员专供 注意保存

风景工作参考

主办单位：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

(总第239期)

本期要目

- 住在国家公园：矛盾与共生
- 沉甸甸的“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
- 有票进不去 梵净山“线上黄牛”从哪来
- 33年前，中国开始将好东西拿出来，申报世界遗产
- 景区运营是个“慢生意”
- 环保供电两难全？坦桑尼亚最大水电项目恐破坏世界遗产
- 罗马城地标西班牙台阶“禁坐令”引争议

2019年8月15日

(所载内容不代表本刊观点)

目 录

热点关注

- 住在国家公园：矛盾与共生 -----3
沉甸甸的“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 -----9

新闻摘要

- 有票进不去 梵净山“线上黄牛”从哪来 -----14

社会纵横

- 33年前，中国开始将好东西拿出来，申报世界遗产 -----16

时事评论

- 景区运营是个“慢生意” -----21
国家公园应推动生态产品价值转化 -----23
理顺利益关系才能行稳致远 -----25

世界遗产

- 环保供电两难全？坦桑尼亚最大水电项目恐破坏世界遗产 -----26
如何让世遗“魅力永驻”？日媒：吸引外国游客很关键 -----27
缅甸蒲甘寺庙列入世遗后禁止游客攀爬 -----29

环球博览

- 罗马城地标西班牙台阶“禁坐令”引争议 -----31
-

住在国家公园：矛盾与共生

【澎湃新闻2019年8月5日】在长三角人口稠密的都市群里，许多人不知道驱车几小时就能到达一片原始森林，那里是地球上同纬度地区独特的低海拔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涵养了钱塘江水。现在，那儿正在试点钱江源国家公园。

对于居住在公园内的近万居民来说，伐木等“靠山吃山”的生活方式曾经是重要的营生。现在，国家公园要求实行最严格的生态保护。于个人和家庭而言，能否在其中找到未来生活的新可能，将是不可回避的问题。

村的矛盾

高田坑的旅游发展计划在钱江源国家公园试点批复时戛然而止。村委书记方善飞和主任余佳彬的手机里都还留着彼时的规划图：村子的最高点一座观星台将拔地而起，游客可以驱车开上陡峭的山坡，入驻横跨在半山腰的穹顶型度假屋，伴着繁星入睡。

两位年轻的村干部脸上，掩不住的失望和困惑。“有专家来看，说你们这动静太大了，得改。”余佳彬一边说，手上一边来回划着那张图。

这个浙西山坳里的村庄，隶属衢州开化，刚刚尝到乡村旅游的滋味。周边村子，有的依山畔水，有的靠着春天的油菜花，都改头换面。高田坑作为浙赣交界处盘山路尽头的最后一个目的地，对外的唯一一条公路2005年才开通。这个默默无闻的山村，直到6年前，一帮天文爱好者露宿在那儿，意外地发现它的星空别有意境——高田坑海拔600多米，算是浙西高点，这个村子才慢慢有了名气。

2014年，村里获得各方支持，开始规划江南“暗夜公园”，然而这个村里人人都盼着的旅游项目，2016年因为被纳入长三角唯一一个国家公园试点而停滞下来。

“考虑到这可能破坏山体，造成水土流失，我们就马上叫停了。”钱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汪长林说。

1870年夏天，蒙大拿州律师赫奇斯（Hedges）和一支19人的队伍进入黄石探险。随后一年多，他和一些有识之士致力推动保护黄石景观的完整性。1872年，美国总统签署法令，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

现在，国家公园是受到广泛认可的保护地形式。在全球100多个国家里，国家公园都意在通过适度有限的开放，保护更大范围的生态系统。

而在中国，它刚刚萌芽。

高田坑所在的山域，向北连接着浙江境内第一大河钱塘江源头，沿着山脉向南则是古田山的原始森林，那里是白际山脉的一部分。在江南数不尽的小景里，白际山没什么风头，许多人甚至不知道从江浙的超大型城市驱车几个小时就能到达一片原始森林，但在植物学家眼里，它的地位无可取代。

在古田山，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古田山站常务副站长任海保和他的同事自2002年就开始建立监测样地。人迹罕至的地方，青苔爬满山路，即使是深冬，林木也只在星星点点的地方褪了色，天际还是被层叠的树叶遮盖着。

如果在地球仪上搜索，会发现世界同纬度其他地区大多为荒漠或荒漠草原，但是到了中国却很不一样。任海保解释说，这是因为青藏高原隆起，形成了东亚季风气候，孕育了独特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它们从东部的舟山群岛延伸到青藏高原东部边缘。但东西部又由于海拔落差，形成了不同类型的植物群落。

“在人口密集的东部，绝大部分森林都因为人为干扰而退化成了次生林、人工林或是荒地，只在钱江源一带，保留比较完整、原生性的低海拔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任海保说。

作为标杆的美国国家公园让人想起无尽的荒野，在中国，自然保护地却不得不面临如何破解人与自然共生的难题。除了山林，目前批复的钱江源国家公园试点面积252平方公里，涵盖浙江开化境内四个乡镇的21个村子，近万人口。

2019年7月19日，钱江源古田山片区，72岁的村民赖师傅在溪边放牛。他称因野猪泛滥，家中的耕地已经荒废，近三年来以养牛和政府补贴维持生计。

在钱江源源头景区，76岁的村民赖女士等待着游客来购买旅游纪念品、当地土特产。据称未来政府计划收取每年5000元的摊位费，但她去年全年收

入仅有2000多元。

在保尔森基金会生态保护项目总监牛红卫看来，国家公园以生态保护为主要目的，园内通常只提供访客所必需、且适合国家公园管理目标的设施与服务，它们的选址、运营也要尽量减少对环境的影响，这与传统的旅游风景区不同。

美国的国家公园周边有“门户社区或小镇”，它们为访客提供所需的设施与服务，从中获得良好的收益，往往成为“高收入”社区。但它们通常都在园外。由于历史或其它原因而存在于公园内的社区，生产生活要服从于国家公园建设和管理的目标和要求，如何做到双赢，是考验管理者、地方政府与社区的难题，牛红卫强调说。

2017年发布的《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中提出，国家公园的首要功能是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不久前发布的《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指导意见》中要求，国家公园实行分区管控，核心保护区禁止人为活动，而一般控制区限制人为活动。在保护的前提下，鼓励适当开展自然体验、生态旅游等活动。但在基层，国家公园是新鲜事，没有先例可考，都走得小心翼翼。

余佳彬太了解高田坑是多盼着发展了。30年前，他小的时候，周边的村子都靠着伐木为生，可他们村单要走出去就得两三个小时，砍了木头也没有人买；到1990年代周边都通电了，他们还在烧松枝，用着1970年代建起来的小水电站，每个晚上只有一小时是亮的。后来，通电和通路成了改变全村的大事。“九几年，通电的那一晚上村里放电影，看的什么忘了，但很开心。2005年夏天公路通了，村里中午摆酒，感谢县里领导支持，全村有300多人都来了。”他回忆，“路开通了，不用养猪了，都出去打工，村里一下就空了。”

在中国的经济引擎浙江，高田坑是个另类。不过正是一时的封闭，反倒使浙西原汁原味的乡村风貌得以保留。黄土敷墙，盖上青砖墨瓦，一栋栋靠在一起，或背山或面水，线条简明不讲究装饰，而不像村外一众改造成青砖小瓦马头墙的新式民居。

两三年前，几户人家将屋子改建成了客栈、茶馆和餐厅，但淡季的生意惨淡，他们正盼着新的旅游开发。现在，高田坑的夏夜星空梦好像一下断了

点，不得不重修规划。

在钱江源，类似被叫停的项目还有不少。摸石头过河的钱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领导班子也在试图破解这样的难题。

“说白了，还是保护和开发的关系。”汪长林说，“不是不做，观测星空也是很好的自然教育，关键是不能破坏生态或最少的破坏。”

管理局的想法是，鼓励适当的发展，为社区提供生态就业岗位，同时还可以通过国家公园的招牌，给社区的产品提供品牌溢价，这在国内国外都有先例。

谁的树林

但是这一切，都还是留在纸上的愿景。

在钱江源国家公园生态资源保护中心保护站工作的周崇武记得，他们一开始在村里宣传国家公园，要靠着免费发放一些日用品，多吸引人来参加。站上想了很多办法，拉横幅、发传单，甚至组织看电影。到现在，他在村里转悠，还是被经常问到：他说的那些东西，何时兑现呢？

钱江源国家公园试点成立的首要工作就是对白际山的树林实施严格保护。在许多村民看来，这是动了他们的蛋糕。

那儿过去几十年里是重要的伐木场，但到了1999年，浙江决定着力保护那里的森林。此前一年，中国南方大规模的洪涝灾害被归咎于无节制的毁林和水土流失，各地很快就采取了封山育林措施。在开化，大规模的商业砍伐也降了温，但在村里，伐木依然是许多家庭重要的经济补充，而现在，“连柴也不让砍了”。

曾经在钱江源调研的北京林业大学自然保护区学院魏钰说，开化的禁伐源于国家推行多年的公益林政策，国家公园对山林的保护无非是又将它强调了一番，但人们难以厘清它们之间的差别，这才给国家公园带来“误伤”。

作为国家公园的第一批护林员，邹洪鸣也花了很长时间应对这样的变化。心直口快的他一见面就说，他这个护林员被选上，完全是因为过去偷木头偷出了名。

“说是偷，其实也是自己种的，花了那么多力气，难道还不能砍了？”他辩解。村里的山林承包到户，实施禁伐以后，每年能申请的砍伐配额只有不到一立方，挣500多块钱，胆子大的往往就像他这样在天色将暗的时候上

山去偷伐。

许多村干部也是无奈，有时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除了外出打工，留在村里的机会很少。书记方善飞在2014年推荐邹洪鸣来做护林员，就是想堵住他偷伐的心思，因为当时工资少，他还答应个人掏腰包给邹补上1000块。邹洪鸣觉得平时和书记关系不错，自己也已经快50岁了，不能指望一直砍下去，就同意了。结果第一年他就因为干得好，当了荣誉护林员。

中国的保护者们往往羡慕美国国家公园单一的土地权属——它们大多为联邦政府所有，但在国内，土地权属复杂，人地矛盾是保护中绕不开的门槛。在钱江源，这个国家公园想要保护的森林有近80%为集体所有。

2018年初，开化发布方案对钱江源的集体林进行地役权改革。就是说，虽然不改变林地权属，但政府提高生态补偿金，与村民签订协议，限制他们对树林的使用，约定他们遵守国家公园的统一管理规定。这笔补偿金，按照开化设立的标准，略高于当地公益林每亩每年40元的补偿标准，目前为48.2元。协议还约定，补偿随公益林补偿标准而提高。

但许多人心里并不买账。有人抱怨说这看起来是无论如何都要签的强制性协议，更多的人觉得补偿太少，对他们的生活没有太大改善。

以邹洪鸣家为例，他有确权的林地50余亩，协议保护带来的补偿每年是2000余元，国家公园护林员工资一年12000元，都加起来也不足他过去伐木、偶尔做临时工的收入。

2015年，有游客看中周围风景秀丽，在他家里小住，这给了他启发。当年邹洪鸣就投资13万，把他的小白楼改建成了客栈，靠着每年旺季几个月的收入，全家人的生活才安稳下来。

保护地役权在世界上得到广泛应用。黄石国家公园设立后的19年，在美国马塞诸塞州诞生了全球第一个以保护为目的的民间土地信托机构。它脱胎于当地抵抗环境污染的运动，此后的一百多年，土地信托调动了民间保护的力量，成为国家保护地体系外的重要补充。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苏杨说，在中国，传统是通过土地征收、租用、流转等手段来克服土地权属带来的统一管理障碍，但这不仅耗费资金较多，剥夺了原住民依托土地获得的收益权，还可能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但他也强调，政府在设计保护地役权时应该避免“一刀切”，要区分对生态保护有益和有害的行为，实施奖惩，让人与“山水林田湖草”成为生命共同体。

保护的边界

钱江源国家公园的界碑依省而立，但白际山是横跨浙赣徽的山系，在靠近省界的区域，两省村民毗邻而居，甚至错落而居也是很平常的事。“中央批复的时候，就要求我们要探索跨省保护机制。”汪长林说。钱江源也被寄予期望，要为跨省保护提供经验。

中国过去的保护地常常根据行政边界来划分，可能割裂完整的生态系统。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意图要打破这样的格局。以西部的大熊猫和祁连山国家公园来说，它们一出生就跨省而设。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副研究员申小莉在钱江源观测那里的野生动物。通过红外相机，她发现一些珍稀物种，比如黑熊只零星地出现在古田山北部，黑麂的活动范围则一直延伸到那儿的边界，而在周边，皖赣境内还有许多优质森林，这意味着它们极可能在更大范围“跨省而居”。“划定国家公园边界时，究竟涵盖多大的面积才能实现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保护，需要生物多样性监测和研究来提供科学依据。”她说。

2017年夏天，上海师范大学环境与地理科学学院教授高峻在那里见证了浙赣两个村庄的合作。浙江霞川村和江西东头村的村委会成员坐在一起，在一张红色的折页上签下了合作保护协议。协议约定，双方要加强森林防火、防疫、防盗猎、生态资源调查等方面的合作；江西村民参照钱江源国家公园的森林管护要求保护所属林地，而国家公园则给予管理技术和资金支持。

高峻主持了国家公园体制下的跨省合作课题。之所以推动村级合作，在他看来是因为“由上而下的合作有时候面临很多挑战，所以先从下到上，最后实现上下结合”。

霞川和东头两村坐落在一条山谷里。不知是因为阴沉的天气还是其他，霞川的民居看起来白净又明亮，越往江西一头走就越阴沉，村道的布局也杂乱起来。后来东头的书记曹进良说，两边本来很多是亲戚关系，几十年前划省界那时候，很多人心向着江西，是因为那里的人均耕地比浙江富余，但改革开放后，浙江的优势愈发明显起来。

“以前的老领导说，东头像是最不争气的那个小儿子。霞川开始修路了，我们还要走二十几里地去上学，再后来，他们抽的烟都比我们要贵些！”他说。

现在，钱江源建国家公园突然就让东头看到了曙光。村里原本投资了几百亩高山茶园，但一直发愁卖不出去，对于曹进良来说，如果钱江源国家公园真能建起来，东头不仅能拿到生态补偿，也许还能借着国家公园的牌子，把不瘟不火的经济搞上去。

不仅如此，他还希望国家公园能保护真正意义上的“完整生态”，至少从他的角度看来，山谷里的河流若是溯源，得再从东头村出去至少5公里。但是浙江提出的跨省合作，都只涵盖相邻村庄，以行政边界为限。

“对浙江来说，管理的资金和行政成本都是重要的考虑因素。”高峻说。而如何打破行政边界的限制，真正管理好自然资源的完整性，亟待国家公园体制探索者们去破解。

（记者：余晓冬）

沉甸甸的“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

【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年7月22日】“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是中国获得的第54项世界遗产。它于2017年2月进入预备名单，2018年1月申报，10月接受评估；2019年5月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建议推迟，旋即又在7月的世界遗产大会上出现神奇反转。

列入是附条件的。大会的决议约定了在未来第二期必须达到的目标。恰好，如果申遗成功，中国拥有的世界遗产数量就有望进入“第一”。于是这次申遗过程引来五花八门的解读和判断。惊奇、兴奋、不解、揶揄再加上亲历者历来“不吭声”，使得那片未被熟知的野生世界，一下子成了跌宕起伏故事中的“戏精”。

自然遗产申报，本来就比文化遗产更为复杂艰难。许多价值不能靠解读，还要算数据。我们为啥要为那些叽叽喳喳的鸟儿浪费一个宝贵的名额，申请一项世界遗产呢？

这些系列提名地，是世界上一些最受关注的濒危物种的关键停歇地、越

冬地或繁殖地。而近十年来，这里又迅速进入经济开发的视野。科学家和公益组织已经为此研究和呼吁多年。所以这条线，这些点，早晚会成为公众话题，早晚得更出名——不是成为生态文明的范例，就是演示了人类在处理与自然关系中的无奈。

申请世界遗产，还不是只说清价值那么简单；根据《操作指南》第78条，要有足够的保护和管理机制才算合格。于是，这个遗产名录中第1098项遗产，就不是敢不敢去“摘”的问题了，也远远不只意味着炫耀荣誉和引游客了。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消极易于积极，保护难于开发。这个事有多重沉，不言而喻。

鸟儿才不管啥人类的烦恼。它一路飞越多个国家。请大家各自认领麻烦好了。于是，中国在许多专家惊讶的目光中，在人类活动最为积极和生态干预最为密集的区域，去申请一项自然遗产。

这时，不妨高看一下我们自己，至少不要吝啬鼓励的目光与掌声。

在申遗成功当天，还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为鸟致辞”的场面。

中国代表的致辞是：“我要感谢这个结果，我们都非常清醒地认识到，此次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并不只是一个荣誉，更是任重而道远。”随后，提出修正案来促使提名通过的澳大利亚专家发言：“我们深深地被此次项目的成功所激励，我们也会好好保护澳大利亚境内迁飞路线上的重要节点。”IUCN代表发言时，反复强调“今天是美好的一天”。在此之前，IUCN对“第一期”给出的考察意见是“推迟”，那此时为何不因建议被推翻而沮丧呢？“如果了解了大背景以及我们所有人追求的最终目标，就能够理解其他参与者的出发了。”

国际鸟盟的代表7年前就来到盐城湿地调研。“7年前，当我们完成这项报告时，大家都很绝望，因为当年黄海滩涂被开垦的速度是外界了解的10倍。当时我们估计将有20至30种鸟类因此而灭绝。”随后，在描述了共同进行的努力后，他又讲了这样一段话：“我想中国非常了解候鸟，也清楚它们是如何将国与国、人与人连接在一起。你们在这方面的体会比我遇到的其他任何国家都要深刻，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如此坚定并乐于与中方合作。”

没错，这就是多边！这就是创造世界遗产价值中的合作。在这个联合国至今最成功的“文创产品”中，每一方都有目的，有积极也有妥协；但要努

力去创造都能接受的方法。同时，也要让大家相信你说不出的话。

我认为这个“为鸟致辞”中的每一个字都是发自内心的。虽然价值观不尽相同，但这背后，是人们相信：中国人开始从国家治理高度来推动解决人与自然的平衡难题，并以此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

我在写下这篇文章，复盘这项围绕着鸟儿命运而进行的大规模人类活动时，京城已近清晨：太阳还没有升起，早高峰尚未到来，叽叽喳喳的鸟儿吸引我驻足窗前。即便在窗外不大的林中，10年来出现的不争事实是：各种鸟鸣，要比以前多得太多了一一正是那片充满活力的、并行的世界，带给了我许多生活的愉悦。

不妨，在“第二期”的成果上，同样看好一下中国人，并由此看好这个世界的未来。

作为系列遗产的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二期”还有多远

作为系列世界遗产申报项目，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和第二期之间有何关联？二期申遗将面临哪些挑战……就这些问题，本报“世界遗产”周刊专访了北京大学世界遗产研究中心主任陈耀华。

为什么要继续做“第二期”

“世界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在候鸟保护方面，有什么突出价值？

陈耀华：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有世界上面积最大的连续分布泥质滩涂海岸，是生物多样性最丰富地区之一，因而成为东亚-澳大利西亚这一全球关注的候鸟迁徙路线上的关键鸟类栖息地。世界上最受关注的一些濒危物种在此停歇、越冬或繁殖，比如全球仅存百余只的中华凤头燕鸥，全球仅存数百只的勺嘴鹬，全球野生迁徙种群仅存1000余只的丹顶鹤以及全球几乎所有的小青脚鹬、大滨鹬和大杓鹬。同时，该路线又是一条最脆弱的迁徙路线，保护压力巨大。因此，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在保护和科研方面都具有十分突出的普世价值。

“世界遗产”：在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申遗过程中，获得了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及一些国际组织的支持，这种支持说明了什么？

陈耀华：首先，江苏盐城的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具有突出的普遍价

值，这是相关国家及国际组织支持的基础。

其次，这体现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精神。因为该公约的宗旨是为了人类整体利益，实施全球共同保护。

第三，黄海生态区的保护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力推的一个项目。2012年于韩国济州岛举行的世界自然保护大会上，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全票通过一项关于保护东亚-澳大利西亚迁徙路线尤其是黄海海区候鸟的决议，凸显了黄海海区在全球的重要性。2016年于美国夏威夷举行的世界自然保护大会上，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再次通过一项关于保护东亚-澳大利西亚迁徙路线尤其是黄海海区潮间带栖息地和水鸟的决议，呼吁在黄海地区以申报世界自然遗产的形式促进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最后，这种支持是对中国政府以及江苏省、盐城市责任担当的肯定和赞赏。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自然遗产和生态环境保护，而在盐城这样经济发达、人口密集地区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将为国际社会遗产保护提供中国模式，贡献中国智慧。

2022年1月31日要报出申遗文本

“世界遗产”：在您看来，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二期）申遗该从哪些方面着手准备？

陈耀华：每个提名点都有其独特的价值，是整个系列遗产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比如辽宁丹东鸭绿江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中国境内最北端的水鸟停歇地，是大滨鹬、大杓鹬等水鸟的重要停歇地。

所以，二期申报工作首先要制定一张时间表。从2023年第47届世界遗产大会召开的时间倒推，2022年1月31日，要报出申遗文本；2021年6月要完成包含全部14个提名点的整体申遗文本和保护管理规划，9月申遗文本要送世界遗产中心预审；所以明年就要开始进行相关申遗准备。可以说时间非常紧，几乎没有喘息的机会。

其次，画好一张路线图。要由国家林草局牵头各有关省、市人民政府成立联合申遗领导机构、管理协调机构及工作机构；尽快组织申遗文本专家团队，考虑到工作量大，可以考虑提名点先各自编制申遗文本和保护管理规划；加强各提名点资源本底调查、范围界定、价值提炼；编制整体申遗文本和保护管理规划；要进行提名点的环境整治，达到世界遗产真实性和完整性

等要求。

关键是地方政府要有高度责任感

“世界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二期）申报世界自然遗产将面临哪些挑战？

陈耀华：最大的挑战是时间紧、任务重、难度大。

从申遗准备时长来说，时间压力很大。从保护黄（渤）海候鸟栖息地来说，我们刻不容缓。如果到栖息地现场看，就会切身地感受到随着时间的推移，保护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同时，任务也很重。首先，从组织方面来讲，地方政府要有高度的责任感来统筹规划。

其次，从提名点保护状况来看，保护和发展之间的压力巨大，尤其是在人口密集、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产业优化、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工作刻不容缓。严格保护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已经是中国政府的庄严承诺，国家也已经发布了关于海岸线保护利用、围填海管控的严格措施，有关地方政府需要积极跟进，践行生态文明，走绿色发展之路。

第三是要做好科学研究和监测工作，即对提名点的生态环境、鸟类、底栖生物、风电设施的监测等。比如要对丹顶鹤、鸕鹚类等跟踪监测，开展风电对鸟类影响的监测及预警等。

最后就是范围的划定。如何根据资源价值及空间分布、保存状况以及世界遗产完整性要求划定合理的申报范围也将是一项艰巨的工作。目前的数据显示，二期提名地总面积260330公顷，缓冲区200335公顷。它们尽管基本具备保护地属性，但具体申报范围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界定。14个点涉及的范围很广，无疑增加了范围确定的难度。

链接：“第二期”涉及的地区将更多

辽宁：丹东鸭绿江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长海海洋珍稀生物省级自然保护区、蛇岛老铁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大连海滨-旅顺口风景名胜区、双台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河北：秦皇岛山海关石河口、北戴河-鸽子窝/新河口、北戴河新区黄金海岸自然保护区、滦南-嘴东滨海湿地、曹妃甸湿地、沧州南大港湿地。

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江苏：如东海滨和启东长江北支口保护区。

（齐欣、赵晓霞、段易成）

新闻摘要

有票进不去 梵净山“线上黄牛”从哪来

【北京商报2019年8月15日】在OTA平台上高价购买景区的门票，临到门口却被告知门票无效……近半年来，这种情况已多次出现在一年前“申遗”成功的梵净山。就此，梵净山景区官方微博一连发布两条微博，明确表示尚未授权任何第三方平台商家代售门票。8月14日，北京商报记者就此分别联系了涉事景区及OTA平台。景区方向北京商报记者独家透露，此前确实接到多起投诉，甚至还有部分商家欲使用黑客技术直接进入景区票务后台获取门票，“这些平台上‘代售’门票的商家相当于一种新型的票务黄牛”。景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票代谜团

去年7月，成功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贵州铜仁梵净山，作为我国第53处世界遗产和第13处世界自然遗产，一度成为了当地的“网红”景区。然而，拥有了“世遗”、5A景区等多个光环的梵净山，却在门票销售上遭遇了“黄牛”的难题。

“最近半年，尤其是到了暑期旅游旺季，我们景区多次接到游客投诉，称自己在OTA平台上购买了门票后，却在梵净山‘山门’外被告知门票无效，最终没有能够进入景区。”梵净山景区相关负责人告诉北京商报记者。而根据该景区官方微博发布的消息，游客反映相关问题涉及的平台涵盖了携程、飞猪、美团、去哪儿网几大OTA，且售票商家都是入驻这些平台的第三方企业，但景区此前并未与任何网络平台、企业签订门票代售协议。

上述景区负责人坦言，根据调查，游客在未授权网络平台、商家处购买的梵净山门票，售价普遍在每张350-380元，而景区官方票务系统的标价才

每张200多元，“相当于这些商家只进行了一个‘代抢票’的服务，就向消费者多收取了100多元每张的费用，而且还不能保证100%抢到票”。

就此，有OTA向北京商报记者证实，近几个月确实接到过消费者关于梵净山景区门票无效相关情况的投诉，但均第一时间向消费者承诺退款以及负担额外购买门票费用等。但另一方面，也有平台称，该企业此前从未上线过单独的梵净山景区门票或者套票产品，只有一日游、当地游这类涵盖门票的打包旅游服务，且从未接到因门票无效而导致的投诉等。

虽然景区和OTA双方就门票代理销售情况各执一词，但上述所有OTA都明确表示，目前平台上并无在售单独的梵净山景区门票产品。

售票模式之变

“其实，在原先的景区售票模式下，梵净山本身是有票务代理系统的，并签订了旅游企业作为总代理，但随着分时、实名网络售票系统的启用，原本的票代合作就无法持续了。”景区相关负责人告诉北京商报记者，新系统要求购票人一张身份证对应一张门票，并且要事先确定入园时间，因此，景区就不能每天按照一定数量将门票分给总代理，再由总代理按比例分发给其他代理方。

据介绍，目前梵净山景区都是在游客来访前一天放出5000张左右的第二日门票，并在门票使用当日再分批、分时间段上线2000-3000张左右门票，“总体来说，梵净山目前每日售票量在1万余张，其中旺季团队票与散客票的比例在2:8或3:7”。该负责人表示，未经授权的网络平台和商家一方面会提前一周左右将门票“预售”给消费者，再按时于官方系统中“抢票”；另一方面，还有一些“资深黄牛”企业，会采用黑客的技术绕开售票系统取得门票，虽然最终都被景区拦截了，所拿到的票被判定无效，但这些商家仍然会将“假票”卖给消费者牟利，造成游客利益受损。

“不论是上述哪种形式，消费者抵达景区后才被告知门票无效，如果恰巧当日门票又售罄的话，商家即使在被追责的过程中退还了费用，也往往很难弥补游客为抵达景区所耗费的食住行费用等。”有专家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

过渡期监管难题

在上述专家看来，之所以目前OTA上出现了“黄牛”销售无授权有风险

的门票甚至假票的情况，主要还是因为在景区门票管理、销售模式开始改革的情况下，OTA与景区还未充分对接上，在这一过渡期被违法商家钻了空子。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兴斌也表示，这显然是冒牌的票代在利用OTA的流量打擦边球甚至违规进行代售的情况。

对此，去哪儿网、飞猪等多家OTA相关负责人也无奈地向记者表示，在OTA与景区还未就新的票务销售模式、代理模式进行充分沟通的情况下，OTA本身无法实时掌握每个景区门票具体销售方式、价格等信息，也确实很难与每一个入驻商家确认代理的门票是否全部有效，“一般商家在OTA上入驻、开启一项新业务前，平台主要会审核企业是否具备相应资质等内容，但具体到所售门票是否有效，目前基本只能通过消费者的投诉来了解具体情况，并在接收到投诉后给予下架等相应处理”。有OTA相关负责人向北京商报记者透露。

不过，上述梵净山景区负责人告诉北京商报记者，目前各家OTA都在与景区主动进行接触和沟通，其中美团点评已经将梵净山加入了“白名单”，即之后平台上所有商家将不会出现未经授权擅自销售门票的行为。与此同时，梵净山也将OTA接口做到了景区分时售票计划之中，目前正在和各平台商讨新的合作模式，希望在杜绝合作过渡期乱象的同时，能让每个OTA都获得接口可以对接景区的后台票务系统。此外，景区自身会升级售票系统，将原本提前一天售票的方式逐渐改为提前五六天放票，让游客能够错峰购票。

（记者：蒋梦惟）

社会纵横

33年前，中国开始将好东西拿出来，申报世界遗产

【搜狐旅游2019年8月1日】今年，我们又多了两处世界遗产，总量达到了全世界第一。然后呢？当我们住了很多年的家突然变成了景区，当收了很

多年门票的景区突然变成了遗产，这事情就没那么简单了。当普天同庆时，我们还想多问一个问题：那些成为世界遗产的地方，都怎么样了？

丽江：成为世遗，然后逐渐死去

如果问丽江从什么时候开始死去的，请回答1996。从这时开始，打造旅游城市成了丽江最重要的任务。1997年12月4日，丽江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它此后要做的一切，就是按照计划搭建一个理想的古城。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丽江主要做了几件事情：建立了古城房屋维修审批管理制度，保护原有古城建筑；对古城的市政基础设施系统进行现代化改造；征收“古城维护费”；控制古城的商业活动，将与古城氛围不协调的商业行为，如玉石店、理发店、卡拉OK厅等全部迁出古城。

每一个看似为了古城好的措施，都在加剧着古城文化的衰败。把古城单独划出来，征收“古城维修费”，变成了一个保护区，反而让古城像个外来者，跟这座城市格格不入。

而古城的真正死去，是从当地人的离开开始的。硬生生划出来的边界，让古城根本无法容纳增长的居民，古城内房价陡增，很多人开始选择将房子租给外地人，而自己生活在新城。为了“看起来更像古城”，丽江迁出了许多便民店。

成为世界遗产前，古城内有着多个农贸市场和日用商店，后来，甚至在小学附近连书店、文具店都找不到了，全变成卖旅游商品的店了。

打着文化保护的旗号，丽江古城早已不是一个适宜居住的地方。2009年，四方街地区的房东有超过80%选择在新城居住，留在中心地区居住的人不足10%，而这些留下的居民也仅仅是参与对古城的管理或清洁工作，真正的生活中心也在新城中。变成世界遗产之后的10年里，当地纳西族居民从原来的4万人减少到了几千人。

1997年，丽江古城成为世遗时，世界遗产中心副主任梁敏子曾告诫：申报的成功意味着保护责任的加重，从现在起丽江人民必须对全人类负责。但丽江负得了这个责吗？

“你不能指望我们这个小地方、小百姓一下子解决世界性的难题啊！”就在丽江被点名批评那年，时任丽江市委书记和自兴曾对媒体说：“你说，是不是太难为我们了？”

杭州西湖：是世界的西湖，还是杭州人的西湖

相比于丽江的“腾笼换鸟”，杭州人对西湖的态度很明确：西湖就在我们杭州，谁也别想把我们换走。

当一个世界遗产，出现在城市里面，处境可能大不一样。

自公元9世纪以来，无数的人文墨客都曾到过西湖边，建起亭台楼阁，堤坝庙宇，给这片山水带来了丰厚的人文沉淀。1979年，西湖逐步实行了景点的门票制，六和塔等景点门口装上栏杆，开始收起了门票。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西湖大名，无人不知。每年光景点门票，就能给杭州贡献2000多万。

2002年，杭州开放全部的西湖，把西湖还给杭州市民。也是从这一年开始，西湖开始了长达10年的申遗路。在这十年中，他们引入钱塘江水，让西湖的水能一月一换，湖水透明度从50厘米变成了79.8厘米；新增了100多万平方米的公共绿地，修复了西湖的自然生态；保护修缮和恢复重建了180多处自然和人文景观；恢复了0.9平方公里的湖面。

2011年，西湖成为世界遗产。当时的西湖申遗小组组长王国平承诺，6项不改变：“还湖于民”目标不改变，门票不涨价，博物馆不收费，土地不出让，文物不破坏，公共资源不侵占。

但家门口的湖被冠上了“世界”的头衔，杭州人还是会不禁发问：西湖还是我们的吗？

申遗成功后的第一个国庆节，西湖就来了518万人次，比前一年多了34.7%。最多的一天，西湖景区就挤了230万人。要知道，西湖核心景区的客流规划上限仅仅9万人次。

本地人难免开始有怨言：平时没时间，一到周末西湖边都是人。虽然生活在杭州，可感觉西湖离杭州本地人越来越远了。不少学者也跳出来说：赶紧取消免费，不收费，这西湖就没法走了。

所幸，杭州政府还是大胆坚持开放西湖，舍得把湖交给公众，把世界遗产交给全世界。

世界遗产之于西湖，在名气上是锦上添花，在保护责任上，担子却重了不少。当然，这需要承担巨大的压力：既然是给公众的，就不能“搞特殊”，消费上万元的会所，一周之内就给关掉了30家。2007年，浙大的一栋

72米高的楼因为影响了西湖的景观，被爆破拆除。站在白堤上，你会看到一栋楼直直突出山脊，这是西湖边的香格里拉饭店。2019年东楼承租期满，杭州政府立刻着手实施降层环境提升等措施，把这栋7层楼拆掉2层，最终确保你在西湖往每一个方向看过去，都是名副其实的“三面云山一面城”。2018年国庆，为了保证厕所不断纸，用掉4000卷厕纸。甚至还有经过专业培训的巡逻员，看到有神态不对的人，就会主动上前，防止跳湖自杀。

要平衡世界遗产的保护和发展，需要长时间去解决，杭州迈开了那一步。西湖，已经活了2000年，杭州对西湖的目标是，让它再活2000年。

福建土楼：外出的年轻人全跑回来了

丽江800年，西湖2000年，而有些世界遗产，才100年，就快“死”了。

福建漳州，南靖县，土楼之乡。古时，客家人从中原迁至南方深山，为了抵御猛兽、外敌，巧妙利用山间狭小的平地和当地的生土、木材、鹅卵石，合全族人之力，建造出土楼这种群居建筑。直到1972年，还有土楼落成。但随着时代发展，多人群居、毫无隐私、没有厕所、木板隔音差、来往隔阂多……土楼不好住了，人们纷纷走出土楼，走出大山。年轻人都走了，只剩下老人和老土楼，相依为命。

2008年7月，20座土楼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尽管申遗前，土楼管理方一再宣称，成功后不会涨价。然而事后却是：次年6月，田螺坑门票从50元翻倍到100元；华安土楼群，从30元翻了三倍直接到90元；永定初溪土楼群门票，从原来的50元涨为70元。

成为世界遗产后的10年里，南靖县的经济坐上了火箭。到2017年，土楼景区接待了450万人次，旅游收入25亿，比2008年增长了13倍。

世界就是这么奇妙，自己的家突然成了世界级的景点，那些巴不得逃离这里的人们，又马不停蹄地往回赶。有人回土楼开了民宿，有人当起了导游，还有人开饭店、种茶叶、卖特产……10年里，陆陆续续回来了2万多人，大家都很自豪地说“我是土楼人”。政府和景区也增加投资，新建厕所，改造电路，让土楼里的人能好好做顿饭。这一切，都指向一个事实：本地人回来了，死去的土楼又活了。

世界遗产，一个金字招牌彻底改变了这个县。那些知名的土楼前，生意自然火爆，但巴西烤肉、螺蛳粉、烤鱿鱼也随游客而来，浓厚的油烟味弥漫

在饮食清淡的客家地区。但除了这些有名的大土楼，全县还有15000多座土楼，由于年久无人住，面临倒塌的风险。

土楼人回来了，土楼和背后的客家文化，又该如何留住？

福建省建筑设计院原院长黄汉民建议，可以迁出大部分土楼人，只留一小部分原住民住在土楼里。他希望“留下来的这部分人，必须深刻了解土楼文化，按土楼最原始的状态生活，逐步恢复土楼的生命活力。”

是不是眼熟？迁出原住民，只留下表演性质的区域，丽江就是这么“死”的。刻意维护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有人住，用起来，才是最好的保护。对于那些返乡的年轻人来说，留下与发展，故乡与个人，能平衡，能兼收，多亏了这些祖传的房子。

可以说，土楼救了南靖，未来，要看这些南靖人了。

申遗这门“生意”

2010年8月2日的凌晨，湘西新宁县的人们都在欢呼——他们申报的“中国丹霞”，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这次申遗，总耗资10亿，其中有4.5亿都是这个县承担的。

对于这个在当年财政收入才1.7亿元的小县城来说，我不相信，他们出于对人类文明遗产的责任感，举全县之力去扛起这份责任。跟这些新宁县老百姓一样，我只能选择相信：申遗可能带来的巨大的、翻天覆地的经济变化和腾飞。他们赌对了。申遗成功后，公路、机场、酒店都批下来了，旅游收入一直攀升，曾经的贫困县也脱贫了。

有一夜暴富的，也有赔本赚吆喝的。几年前就有报道说，平遥古城出名了，结果一年最多公务接待10万人次，反而少了1200多万元收入，不堪重负。尽管申遗成功已经10多年，平遥仍然因缺乏保护资金导致城墙坍塌，若要为古城开发所需的新城开发及古城搬迁，至少还存在20多亿元的资金缺口。贵州荔波和云南石林、重庆武隆捆绑成功申报“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后，小县荔波为此背上高额债务，未来10年里还得投入巨资用于遗产地保护。

不论是经济发达的大城市，还是亟需告别贫穷的小城市，申遗都是件大事。它关系到旅游开发、GDP、地方政绩和城市名片……而这些申遗的结果中，最应该关注的，是责任和义务。这一点，才是中国加入《世界遗产公

约》的目的。

家门口有个世界遗产，跟我有啥关系

33年来，这些成为了世界遗产的地方，多多少少都给当地带来了改变，有些一跃而起，有些尚在挣扎，但都让当地政府、当地人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家门口有个世界遗产，和我有什么关系？

中国申遗33年，保护的却是纵贯70万年的历史：从70万年前北京郊区的那个直立人头盖骨，到5000年长江入海口沼泽地里的良渚古城，再到仅仅不过百年的开平碉楼……中国申遗33年，也在逐渐认清：世界遗产，以前是份荣誉，如今更多是一份责任。

从某种角度讲，世界遗产是城市的基因显现，力量所在。活在某一座城，便自然生长得带有其精神气质和人格底蕴。城市为每个人的内心输送着漫长历史所积淀下来的种种地域特质。

当世界遗产不再只和利益挂钩，当更多的城市选择担起一份责任，我们才能借由这些伟大的遗产，像70万年前站立起来的那位北京人一样，仰望星辰，陷入沉思：我是谁？我从哪里来？

没有一份荣誉能久远不灭，没有一份责任能自发生。但若立于荣誉之上，所有对于过去的守护和传承便自然而然，所有对于未来的讨论和设想便顺理成章。如此，从世界遗产谈开，每一座城，均有属于自己的荣誉和责任。而这，便是未来城市最初且最好的模样。

（编辑：易向）

时事评论

景区运营是个“慢生意”

【工人日报2019年8月7日】根据文化和旅游部7月31日发布的公告，7家质量严重不达标或存在严重问题的5A景区被处理，其中山西省晋中市乔家大院景区受到了顶格处罚，即“被取消质量等级”，也就是被摘牌。

让乔家大院被诟病的不只是门票价格从2008年的40元涨到如今的138元，很多游客反应其商业化严重，管理不到位。根据文化和旅游部的通报，乔家大院存在的问题包括“旅游产品类型单一；过度商业化；交通游览方面存在不足；安全卫生投入不够；景区综合管理有待提高；资源保护有缺陷”。简而言之，就是景区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商业开发上，却忽视了服务品质和文化价值。

乔家大院被摘牌，不代表其它景区不存在同样的问题。有的景区把自己变成了包租公，各类小商店一间接一间，有的景区把自己变成了交通队，利用游客不得不坐的电瓶车，变相收取额外费用。更为关键的是，基于文化遗产或自然资源而打造的景区，通过向公众征收高额门票以及出租景区资源，产生的收入没有合理用在文化遗产、自然资源的保护和研究上面。

基于文化遗产或自然资源打造的景区，该不该委托给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经营，业界观点是不统一的。赞成者认为，很多景区所在地本就偏僻，当地旅游管理水平有限，不如委托经营，既能减少不必要的支出，又能利用企业资源推介景区。

反对者则认为，这种委托经营一般是在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将特许经营权出让一定年限，企业天生具有逐利性，势必会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取得高收益，压低成本。在此基础上，抬高门票、广收租金却怠于在旅游管理、资源保护方面进行投入，就不足为奇了。

其实，导致这一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景区是否该委托经营，而在于经营过程是否受到有效监管，收入分配和再投入是否有规可依。基于文化遗产或自然资源而打造的景区，不同于企业投资建设的主题公园，后者以盈利为目的，自订票价，出租店面皆无可厚非，而前者的运营目的，则是更好地为公众提供文化和休闲服务。

在这个背景下，基于文化遗产或自然资源而打造的景区，其在门票价格制定上应当考虑公众收入，在景区内经营活动应该以有益文化传播和大众休闲为前提，在旅游管理、资源保护方面的投入应当有固定比例，但是，究竟这类景区该如何委托经营，票价制定以何为依据，收入如何分配，迄今缺乏相关细则。

有的人会说，旅游开发会引来大量游客，令当地社会管理成本和公共事

务支出增加，如果景区不大量赚钱，地方经济如何发展，如何保证社会管理和公共事务的支出？

发展旅游不是只靠一个景区竭泽而渔，而是要发展包括各类旅游服务项目在内的整条产业链，在景区内被狠宰的游客，还会为当地其它旅游服务项目买单么？相反，指着一个景区“赚够钱”，游客离开景区之后，也会迅速离开当地，形成“旅长游短”，如今消费者更倾向的文化游、休闲游、深度游自然无从谈起，当地的旅游产业链也难以形成。

景区运营是个“慢生意”，切不能总想着“赚快钱”。景区的可持续运营，不仅有助于景区的长远发展和资源保护，也有助于促进当地旅游产业链的整体发展，最终引导消费者在当地深度旅游消费。

当然，让景区运营成为一门“慢生意”，不仅需要当地管理者和景区运营者具有长远视野，也需要相应制度保障。否则，“赚快钱”的冲动，谁来控制呢？

（记者：赵昂）

国家公园应推动生态产品价值转化

【学习时报2019年7月31日】当前，在我国尤其是西部地区，国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既是生态保护重点地区，同时又是欠发达地区，还往往是少数民族集中聚居区，生态保护与区域可持续发展、民生改善的矛盾比较突出。为了更好地推动生态产品的价值转化，需要从生态资源挖掘生态产品，构建生态产品的价值转化机制，打通生态保护、生态产业转型和生态富民三大通道，实现生态环境保护、绿色发展、民生问题改善的共赢局面。

立足于生态产品，探索生态经济合理的市场运营模式。国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的生态产品不仅具有原生态、纯天然的特质，而且其生态资源和产品具有显著的稀缺性和有限性。基于此，其生态产品在价值实现的过程中，要在政府主导的原则下，推动当地居民、企业和社会各界人士的积极参与；要在保护稀缺性资源的前提下，注重传统生态生产方式与稀缺产品定价相结合的市场化运营模式；要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前提下，坚持以产定销的原则，努力实现资源保护和绿色经济协调发展的双赢局面。

在保护的前提下，推进生态经济化和经济生态化协调发展。国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的首要功能是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要在这个大前提下对生态资源进行科学合理的开发利用和保护，需要注意生态经济化和经济生态化的有机协调。一方面，致力于生态资源的经济价值转化。可以通过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安排、流转和有偿使用，实施自然资源保值增值的激励政策，开展特许经营等，鼓励支持当地居民、社区、社会组织、企业投身从事生态保护事业，并从中获得相应的收益和补偿，从而把生态优势、生态财富有效地转变为经济优势和社会财富。另一方面，遵循绿色发展、资源循环和低碳环保的原则，在国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所在区域中，推动发展有利于生态保护的生态农牧业、生态旅游和民族特色文化产业等，积极构建与国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目标定位相适应的生态友好型产业体系。

坚持统筹规划，实施分区分类的差异化化管理。由于地域差异，不同的国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具有各自不同的资源禀赋、环境承载力、目标定位和环境保护标准，对此，要在充分考察、识别地域条件差异的基础上，列出适合不同国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类型的生态友好型产业清单，对国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园区内外产业进行统一规划、总体布局。在国家公园内部，不仅要加强对功能分区实行差异化保护、修复和治理措施，而且要根据功能分区的保护策略，精准定位符合其发展条件的生态产业。比如，在核心保育区，只允许适度的科研和环境教育；在传统保护区、一般控制区可以布局生态农牧业、生态旅游等对生态影响和干扰较小的产业；对于特色文化产业、农畜产品加工业和商贸服务、农家乐、牧家乐等产业，更多布局在保护区外的扩散区和服务区。

坚持以人为本，生态惠民、产业富民。落实好生态管护岗位、生态补偿等政策措施，完善和保障群众稳定收益的长效机制。发展生态友好型产业要更多地与群众转岗就业、提高素质相结合；特许经营的产业要更多地向低收入群体、困难群众倾斜，使该区域的居民群体能够享受到国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建设与发展带来的积极成果，从而激发群众参与生态保护的内生动力。

总之，国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在实现生态产品价值的转化过程中，生态保护是前提和基础，生态产业转型必须以生态保护为基本原则；生态产业转型是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基本途径，产业转型必须以法律法规为基本准绳、

以当地的区域环境承载力为依据，以自然生态环境的最优保护为目标，因地制宜，因时置产；生态富民是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最终目的，生态富民能够有效地提升当地群众的环保意识，增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群众更加积极地投身于生态保护事业，珍惜身边的生态资源，推动当地生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杨汝坤）

理顺利益关系才能行稳致远

【中国旅游报2019年8月5日】据报道，云南普者黑景区近日发生部分民众阻止景区正常运营事件。随后，丘北县委宣传部通报称，经做工作，聚集民众已经散去。下一步，丘北县将继续组织人员做好民众的思想稳定工作，认真做好政策解释工作。同时，进一步加快区域内餐饮住宿业整治，加快普者黑基础设施建设工作。

随着高铁开通，昆明到普者黑的交通时间压缩到1个多小时。交通的改善，让普者黑景区游客暴增，游客数量的急剧增加与普者黑旅游基础设施滞后的矛盾日益凸显。

从旅游开发角度，地方村民都希望搭上旅游发展的快车，但分散的个体往往缺乏投资和管理能力，因此引入熟悉市场运作的经营者是必要的。但作为政府招商引资的成果，景区经营者有较强的话语权，往往会忽视原住民的利益，这时候，心理不平衡的原住民，就会用自身的优势与景区运营者争抢“蛋糕”，从而产生矛盾冲突。

要解决这一矛盾，就需要从全域旅游的理念出发，建立企业与村民之间长远而合理的利益分配协调机制，引导景区唱好主旋律，村民谱好协奏曲，景区搞开发，村民搞配套，让景区和村民都能从中获利。

就景区而言，虽然经营者出了钱，但村民也出了“生态”，双方必须明确相应的利益分配。一味采取“围城”开发的形式，回避景区与原住民的矛盾，并不是行稳致远的发展之道。

就村民而言，必须考虑自身利益与能力之间的平衡，盲目地与景区争抢蛋糕并不能实现效益最大化。同时，维权也要依法合规，要理性表达诉求，

任何过激行为的维权，都会得不偿失。比如可建立“景区+合作社+农户”的运作模式，合作社或理事会共同承担景区管理的职责，共同参与景区的管理工作，并代表村民和景区就相关事宜进行有效沟通。

总之，在发展乡村旅游的过程中，村民应得利益能否被保证，直接关系到旅游项目预期发展目标能否顺利实现。只有用全域旅游的思路，处理好景区和村民的利益关系，乡村旅游才能行稳致远。

（丁慎毅）

世界遗产

环保供电两难全？坦桑尼亚最大水电项目恐破坏世界遗产

【世界说2019年8月5日】当前，坦桑尼亚主要依靠天然气和水能发电。虽然不缺天然气、水、风以及太阳能等发电资源，但据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统计，全国仅有约33%人口可以用上国内生产的电力。鲁富吉水电站项目总装机容量为2115MW，是迄今坦桑尼亚最大的水电项目。建成后，可使该国目前约562MW的水电装机总容量增加3.7倍左右。

去年12月，从1980年就开始计划的鲁富吉水电站项目，以协议的方式正式授权埃及公司阿拉伯承包商（The Arab Contractors），以及爱思瓦迪电气公司（Elsewedy Electric S.A.E）组成的联营体建设。7月26日，该项目开工建设，预计2022年4月可实现设计发电量，项目预计总耗资29亿美元，由坦桑尼亚政府出资。

据肯尼亚《东非人报》报道，坦桑尼亚总统约翰·马古福利（John Magufuli）表示，政府将借此项目，将坦桑尼亚人民从电力短缺中解救出来。国家的工业经济也将依赖由此带来的充足、廉价和可靠的水力发电供应。

据新华网7月22日报道，坦桑尼亚新闻部主任、政府首席发言人哈桑·阿巴西（Hassan Abbasi）表示，项目实施的三年时间里，将带动坦桑尼亚约

1.2万人直接就业。政府还会通过钓鱼、乘船和摄影旅行等相关项目来促进旅游业，并推动当地农业和水产养殖发展。

虽然被寄予厚望，但是该项目却因建设地点，引致环境和成本等相关争议。鲁富吉水电站项目将建于坦桑尼亚鲁菲吉河流下游。而鲁菲吉河则流经世界最大的动物保护区之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塞卢斯禁猎区。

塞卢斯禁猎区位于坦桑尼亚东南部。5.46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居住着许多热带动物，包括大象、河马、非洲野犬、好望角水牛和鳄鱼。此外，该地区也是濒危动物黑犀牛的保护区之一。

项目面临的主要争议在于，建设大坝需要砍伐塞卢斯禁猎区1436平方公里的260万棵树木，将淹没面积约1200平方公里的区域。

2018年5月，当坦桑尼亚森林服务局结束上述砍伐树木销售招标时，世界自然基金会（WWF）曾回应称，这一招标是“违法”的，因其未在此之前完成环境影响评估。

尽管坦桑尼亚政府随后补上了新的环境影响评估报告，但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却在委托第三方进行的一项独立审查报告中指出，在项目对该遗产地的具体影响方面，坦桑尼亚政府没有可靠的评估，并质疑该项目的经济可行性。IUCN还联合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呼吁坦桑尼亚政府立即停止伐木，以及与该项目有关的其他活动，并警告可能会将塞卢斯禁猎区从《世界遗产名录》中剔除。不过，在2018年6-7月举行的世界遗产大会上，因坦桑尼亚政府提交了环境管理计划和减小影响的缓解措施，塞卢斯禁猎区并未被剔除。

除此之外，2019年2月，来自经合组织观察（OECD Watch）的水电专家约尔格·哈特曼（Joerg Hartmann）在一份报告中指出，算上对塞卢斯禁猎区，以及鲁菲吉河流下游居民的间接影响成本的话，这个项目的成本保守估计为98亿美元，而非政府宣称的29亿美元。

（文/张涵宇 责编/刘冰彦）

如何让世遗“魅力永驻”？日媒：吸引外国游客很关键

【参考消息网2019年8月7日】据《日本经济新闻》8月5日报道，位于大

阪府的百舌鸟-古市古坟群在今年7月正式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由此带来关西地区游客数量的增长令其经济效果备受期待。

据报道，日本已经连续7年有候选项目进入《世界遗产名录》，当地的经济发展均因此受益。但一时的热度散去后，经济刺激效果开始下降的情况也很明显。如何让世界遗产产生持久的经济效益、提升遗产所在地的魅力，仍需我们开动脑筋。

7月8日，参加完第43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的堺市市长永藤英机，在抵达关西国际机场后披露了观光战略的第一部分内容。据说从明年春天起，游客们将可以搭乘热气球从空中俯瞰仁德天皇陵。

民间已经在为吸引游客进行尝试。有一家民间机构在7月13日到15日组织了搭乘直升机游览大山古坟的活动，3天时间共吸引720人参与，6分钟的游览时间每人收费5000日元（1元人民币约合15.1日元）。运营相关业务的航空公司社长表示，如果需求扩大就会有降价空间。

世界遗产的经济效益是巨大的。根据堺市都市政策研究所推算，仅堺市一地就将因此获益约338亿日元，大阪府整体的经济效益更会高达约1006亿日元。研究人员表示，外国游客尤其热衷游览世界遗产。

报道称，巨大的经济效益已经在以往入选《世界遗产名录》的项目中得到了证实。在2019年黄金周期间，2018年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长崎基督教遗址迎来近7.3万名游客，是前一年同期的2.2倍。2017年入选的“神宿之岛”冲之岛及宗像相关遗产群在2018年度共接待游客94万人次，虽然后期不及2018年1月达到峰值时的盛况，但现在该遗产地仍然备受游客青睐。

另一方面，一些地区也出现了经济效益滑坡的迹象。位于群馬县的富冈制丝厂及近代绢丝产业遗迹群在2014年度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当年接待游客133万人次，是前一年度的4倍还多，但之后开始逐步减少，2018年度降至不足峰值年份的四成。

位于岛根县大田市的石见银山遗迹及其文化景观2007年入选世界遗产，在第二年迎来了81.3万游客，是之前的两倍，但到了2015年已经低于入选世界遗产之前的水平。

不过这些地区也在试图东山再起。富冈制丝厂将于2020年在目前处于修复中的“西置茧所（存放蚕茧的地方）”开设画廊和多功能厅，还将在市内

新建介绍制丝厂历史的世界遗产中心。

拥有中尊寺金色堂等世界文化遗产的岩手县平泉町为了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助推消费额增长，正在研究增加坐禅和抄经等体验类项目以及一些夜间游览项目。

如何吸引外国游客也是一大难题。位于兵库县的姬路城是日本代表性的连立式平山城建筑，1993年和法隆寺同时成为日本第一批世界文化遗产。但是在海外的“世界遗产认知度排行榜”上竟然进不了前一百名。

为此，姬路市制定了包括抄经、刀具锻造等项目在内的体验游行程。此外还举办了姬路城点灯、天守阁观日出等活动，着力吸引外国游客。

报道称，进入《世界遗产名录》的确会给遗产所在地带来实惠，但也让那里的开发潜力面临考验。

(<http://m.ckxx.net/wenhua/p/178671.html>)

缅甸蒲甘寺庙列入世遗后禁止游客攀爬

【环球网、光明网综合2019年7月29日】近日，已于7月10日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缅甸蒲甘古城开始禁止游客攀爬寺庙与佛塔。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9日消息，蒲甘古城内共有3500座兴建于12世纪至14世纪间的寺庙、修道院与要塞等文物建筑，均禁止攀爬。

据英国《独立报》26日报道，缅甸政府还计划在2028年前将蒲甘古城内的所有酒店迁往专门划定的酒店区。缅甸政府此前曾禁止游客攀爬蒲甘寺庙，但其后担心禁令影响旅游业，又将其撤销。

据缅甸新闻网站Mizzimar消息，目前蒲甘古城的安保措施已得到加强，更多的安保人员在古建筑周边不同地区站岗，防止游客攀爬古建筑。

“我来蒲甘的最大愿望就是看到壮美的日出与日落景象，”一位名叫William Wright的美国游客说道，“我在寺庙附近逛了三天，想找到一个好的取景点，但我发现已经没有寺庙允许游客攀爬了。这对游客们来说实在令人泄气。”

虽然有人对禁令表示反对，但也有缅甸本国公民对禁令表示支持，希望

此举能维持蒲甘的可持续发展。“重要的是，蒲甘必须对普通缅甸人开放，而不是变为游客专属的游乐场。”缅甸历史学家Thant Myint U告诉《缅甸时报》（The Myanmar Times），“缅甸的学生与朝圣者，而不是富有的游客，应该成为蒲甘规划的焦点。”

漫长申遗之路

蒲甘位于缅甸中部平原，坐落在贯穿缅甸南北的伊洛瓦底江中游东岸，被称为“缅甸的心脏”。公元11世纪，缅族征服了周边少数民族，在蒲甘建立了缅甸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王朝，暨蒲甘王朝。蒲甘建塔规模堪称缅甸历史上的顶峰，建塔艺术集缅甸艺术之大成，迄今依然保持缅甸宗教圣殿的地位。蒲甘文化地区经过漫长岁月洗礼，至今仍保留着3000余座缅甸各个历史时期建造的众多的佛塔、佛寺，是世界上佛塔最多的古城之一。数千佛塔形式不同、颜色各异、高低不一，但都精雕细刻、独具匠心，在国际上享有“万塔之城”的盛誉。

缅甸申遗工程历时漫长、过程艰辛。1995年，缅甸蒲甘和老挝琅勃拉邦同时申遗，但由于对古迹保护不力，蒲甘申遗失败，琅勃拉邦则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一方面，缅甸地区多发自然灾害，地震及洪水频发，灾害过后众多佛塔都会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1975年7月的大地震，致使蒲甘地区百分之八十的佛塔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坏。另一方面，蒲甘作为著名的旅游胜地每年都会吸引大量游客前来，但旅游管理较不成熟，尚未对佛塔加以保护，曾长期允许游客随意攀爬佛塔，对佛塔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此外，由于缺乏修葺管理，每逢灾后，缅甸民众多通过集资手段或自行动手直接进行佛塔修复。作为佛教国家的缅甸不乏虔诚的民众，但由于工程技术条件的限制，这样的善举难以做到“修旧如旧”。

2011年后，缅甸政府越来越重视保护蒲甘古城的长期规划和维护管理工作，并于2014年再次准备蒲甘地区的申遗工作。

蒲甘申遗工作组由缅甸宗教与文化部、曼德勒省政府和马圭省政府、缅甸国内外专家、蒲甘文化热爱者及各相关协会等共同组成，工作组按照蒲甘地区仍存在的或已消失的文化、建筑设计、地方文化风俗、信仰、观点、文学等标准，举行研讨会、管理会议，收集地理信息系统和研究数据。缅甸政府还向国际社会申请援助，邀请国际专家入缅共同参与修缮佛塔工作。

同时，加强旅游业的管理，一方面彻底禁止古城蒲甘区域内所有佛塔的攀登观览项目，另一方面加强对蒲甘地区酒店规范监督，由缅甸宗教事务与文化部、曼德勒省邦共同落实规范批准。

2016年8月，正值缅甸政府筹备蒲甘申遗工作期间，蒲甘地区发生6.8级地震。此次地震及余震先后致使397座佛塔造成不同程度的损伤，有些佛塔甚至直接倒塌。为响应缅甸政府的请求，各国文物修缮专家纷纷入缅进行考察研究，并拟定修缮对策。中国政府在第一时间向缅甸政府进行了捐赠，同时调集国内优秀的专业技术力量，前往缅甸协助进行佛塔修缮事宜。

（记者：南博一、鹿铖）

环球博览

罗马城地标西班牙台阶“禁坐令”引争议

【新华网2019年8月11日】西班牙台阶是意大利罗马城的地标之一，也是不少来罗马的游客一定要打卡的地方。由于著名影星赫本在《罗马假日》里的加持，在100多级台阶的任何一级上坐一坐，吃吃冰激凌发发呆，是游客的必选动作。但最近罗马市政府的一纸台阶“禁坐令”或让这种享受成为过去，并引起争议。

“禁坐令”规定，坐在台阶上将被罚250欧元（约合1977元人民币），坐在台阶上还丢垃圾或损坏台阶，罚款额将上升到400欧元（约合3163元人民币）。

罗马市政府给出的理由是，大量游客坐在台阶上会造成拥堵，而且游客们通常会在台阶上丢垃圾。“禁坐令”是保持城市清洁的举措之一，目的是让罗马对游客更有吸引力。

目前西班牙台阶上不时有警察巡逻，提醒坐下来的人坐台阶是违法的。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坐在台阶上了。

但一些罗马人表示反对“禁坐令”。意大利众议员、政治和社会评论家

斯加尔比告诉新华社记者：“这是罗马管理舍本逐末的一个典型案例。放着那么多问题不解决，罗马市政府却要去惩罚那些想坐在台阶上读几页济慈或雪莱著作的人——这真的有意义吗？”

英国著名诗人济慈和雪莱曾住在毗邻西班牙台阶的房子里，现在已经辟为博物馆。

专门给罗马挑毛病的组织“罗马太糟糕了”的创始人托内利同意斯加尔比的观点。

“18世纪的建筑师桑克蒂斯设计的西班牙台阶就是用来坐的。这个城市有很多问题，但这不是其中之一。”

当然也有不少人支持这一举措。为一家环保组织工作的法焦利说：“罗马必须保护自己丰富的文化，有些时候需要采取乍看起来不受欢迎的举措。”

罗马的药剂师里奇希望类似的保护措施能用于其他古迹。他告诉记者：“他们花了太多精力在西班牙台阶上，你转过街角就能发现墙上的涂鸦，而人们也在街上乱丢垃圾。”

最近几年，罗马市政府在垃圾收集、道路维护、公交建设等一系列问题上招致不少抱怨，这一“禁坐令”能否落实下去，还需要一段时间见分晓。

（记者：刘咏秋、陈占杰）

编辑：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 编译中心

联系人：陈晨 张宇 李简西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7号新疆大厦B座11层，100044

电话：010-88315330 88315308

传真：010-88315325

微信公众号

网址：www.china-npa.org

E-mail：china_fjms@163.net

